

作者主要从经验、语言、体式三个维度梳理，
讨论了晚清到“五四”这一特殊时段诗歌言说方式
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与经验、体式 诗的变奏

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

赖戡煌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经验、体式 与 诗的变奏

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

赖戡煌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验、体式与诗的变奏：晚清至“五四”诗歌的
“言说方式” / 赖或煌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9.3

ISBN 978-7-5201-4311-0

I. ①经… II. ①赖…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8293 号

经验、体式与诗的变奏

——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

著 者 / 赖或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李建廷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8.75 字 数：275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311-0

定 价 / 1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王光明

无论是中国最早的诗学《诗大序》把诗定义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还是近代英国伟大的诗人叶芝认为诗人也是“一个向人们说话的人”，实际上都把诗歌当作一种话语，把写诗作为一种言说方式。但是从诗经到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和“新诗”，中国诗歌真有点像冯至《十四行集》里的《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永远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熟悉的事物中有许多你没有发现的深邃和生疏，而一时觉得陌生的路径说不准曲径通幽正是我们记忆中的家园。因此，即使《诗大序》那样的经典论述我们也无法照单全收，因为所谓诗之“六义”，虽然诗法“赋、比、兴”与世长存，诗体“风、雅、颂”却被时间的风沙所覆盖。而那些突破平仄、对仗、押韵等传统指标，没有建行分节规律的写作，也堂而皇之地戴上了诗的桂冠。

20世纪中国诗歌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作为社会与文化现代转型的有机部分，已经成功改变了许多人的诗歌观念、写作方式和欣赏趣味。不过，人们逐渐接受、习惯了一种新的诗歌类型与艺术趣味，却未必真正理解这次革命的性质。这是“新诗”一百多年来始终争议不断的根源，也是它的写作者大多仅凭“天性”和模仿，而不是自觉摸索新的规律的原因。认识上不去，行动便跟

不上，转型中的中国诗歌要有更广阔的前程，不仅有待诗人们的自觉实践，也有待人们认识和梳理百年行程积累的经验与问题。

或煌师从郜积意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时，做的是传统学问：最后一位大师和现代学术第一位大师王国维的诗学研究，博士论文选择晚清至“五四”诗歌的变革话题，是有学术准备和学术底气的。记得开题前我似乎曾经建议他做新诗“自我”问题研究，因为它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一个重要指标。现在看来，或煌以“言说方式”来聚集和梳理早期新诗的问题，学术效果更加明显。因为“自我”固然是新诗的标识，或者说是新诗的“话语据点”，但它究竟是一种话语立场和话语姿态，有不少心理层面而在学理上说不清楚的东西。而“言说方式”的打破与重建，尽管论题较大，头绪纷繁，却是新诗变革的显现形态，有相对确定的范畴和路径可以追寻：毕竟，始起晚清的“新诗”运动，无论作为名词还是动词，起点是“言说方式”即语言形式的革新，目的也是找到一种凝聚现代经验的“言说体制”和“言说规律”。

将晚清开始的诗歌变革定性“言说方式”的重建，体现了或煌对文学形式自律与他律辩证互动关系的深入认识。他十分清楚作为想象方式的诗歌体式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接纳与聚合不断变化的新鲜经验，也可能扭曲和排斥陌生的经验与感觉。因此，他努力“从美学自律与经验冲击的双重挑战予以考量”，通过语言介质观察“经验与体式之间不断角力、相斥和包容的运动”，并得出了与一般文学史、诗歌史不同的结论：在一般文学史、诗歌史著作中，“新诗”早已功成名就，而在或煌看来则是未竟的事业，“与其说完成了体式与经验互为抹擦中诗的变奏，不如说它仍在变奏之中”。而在具体的论述中，无论对古典诗歌延续到晚清后封闭与分裂状态的分析，“五四”新诗人对白话诗

这一新的“言说方式”的发现，还是从代际差别中发现新诗在获得合法性后在诗艺上、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包括通过对散文诗“以局部的散文结构反总体的散文结构”特点的独到理解，都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处理材料的分析论述能力。一般的文学史、诗歌史都是用材料证明观点，而或煌却努力向人们提供自己对材料的认识与理解，这是难能可贵的。

也许还不能说或煌已经完全实现了理论梳解与历史描述的有效对接，找到了一种更贴近中国新诗特点的研究方法，但他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相信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可。目前的中国新诗研究，大多数人的兴趣都在史的归类描述一边，然而不重视对材料、史实的辨析与分析，其问题与意义就难以得到彰显。更何况我们面对的还是尝试着自我建构“新诗”，简单承认“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远远不够。即使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复原历史，而是要求提供对历史的深入理解。

2015年7月26日

导论 变奏中的诗与“言说方式”的重建 / 1

第一章 闭抑和分裂的古典 / 22

第一节 古典和革新之间的恩怨 / 22

一 革新意识的“成色” / 23

二 作为深度“装置”的古典 / 31

三 黯淡的“新”诗前景 / 38

第二节 复古的困境 / 43

一 两类复古取向：求正与求变 / 44

二 古典的冲突与分裂 / 48

三 走向闭抑的古典 / 53

本章附录

从活力到僵化的以古鉴今之路

——论林庚的新诗观念 / 58

第二章 发现新的“言说方式” / 71

第一节 新文学场的出现 / 72

一 “逼上梁山”和打开新的可能 / 72

二 文学场形成的理路 / 79

第二节 从白话诗到新诗 / 87

- 一 含混的白话诗写作 / 87
- 二 暧昧的诗体认识：与古典格式周旋 / 92
- 三 诗体解放和自由诗的发现 / 100
- 四 如何“新”诗：课题与问题 / 106

第三章 新诗的锻造：延展与分化 / 113

第一节 抒情方式的更新 / 113

- 一 代际差异的凸显 / 114
- 二 与旧格式关系的复杂性 / 119
- 三 从“呈现”到“发明” / 127
- 四 “发明”：作为一种新美学 / 134

第二节 新的美学向度的展开 / 143

- 一 后起者的预备期和不满 / 143
- 二 诗艺和经验的紧张 / 147
- 三 诗艺与情感的纠葛 / 151
- 四 走向不同的抒情向度 / 156

第四章 作为观念建制的新诗 / 161

第一节 不同框架中的诗之构想 / 161

- 一 反对派的谱系 / 162
- 二 美学范式的失效 / 167

第二节 被规训的“旧诗” / 170

- 一 重新规划历史：“整理”的意识形态 / 171
- 二 文学史评判体系的介入 / 180

结语 “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 / 187

附论一 诗歌“言说方式”的当代议题 / 190

在经验与语言的互动中打开更广阔的诗世界

——2000年以来的新诗写作 / 190

美学自律与经验冲击的挑战

——“地震诗歌”的诗学问题再思 / 206

在难以祛魅的世界理解经验、语言和现实

——论刘洁岷的诗 / 217

性别想象中的经验与技艺问题

——论沈杰、青葩、水丢丢和梅花落的诗 / 236

发现和承担经验的复杂性

——近期诗歌中“民生关怀”的言说 / 250

附论二 诗歌“言说方式”的西方视野 / 262

韵律的废退与反抗“散文气味”

——散文诗的美学问题 / 262

主要参考文献 / 277

导论 变奏中的诗与“言说方式”的重建^{*}

诗歌史叙述中，体式的转换往往被视为晚清至“五四”诗歌演变的基本特征，这在胡适的《谈新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文中也有不厌其烦的申说。在形式规范层面，体式一般具有可计量、易辨别的特点，经常用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诗歌的区分，例如古典诗歌被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等，新诗被分为自由诗、格律诗、半格律诗等。然而，体式作为凝定形态的诗文类标识，只能起到笼统的、抽象的聚合作用，它是一种难以涵纳诗所遭遇的经验冲击以及它的书写策略、美学特质的分类。如果把体式中心化，那么，对该时段诗歌的考量，必定是表面和片面的，诗的迁延、转折和激变本关涉诸多要素，却几乎成了具有自主性的形式的重组：旧诗无外乎以或远或近的关系在某些古典诗歌的格式下写就，而以自由诗为鹄的的早期新诗则努力摆脱古典诗歌的格式（包括词调和曲调）。正如一种体式的探索、萌生和形成无法一蹴而就，另一种体式的动摇、瓦解和崩溃也有一个漫长的、藕断丝连的过程，无论旧体式的调适、变形还是新体式的实验、新建，体式本身既不具备使诗持守不易的自足性，也不具备使诗聚合转变的原动力，毋宁说，体式不过是诗的变奏过程中部分形式要素的成型与征显。

以诗歌体式的变动为标志，至多只表明了某种既定的、外在的诗歌形态特征，它无法标记诗歌写作在具体历史语境下遭遇压力及其形变的过

^{*} 本书导论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诗观念史上的关键词谱系研究”（基金号：11CZW059）的阶段性的成果。

程，也很难指示体式本身的活力或情性，更遑论分疏出业已深刻介入文类内部的经验等问题，以及诸要素之间长期的冲撞、分裂与暂时的平衡、媾和。这意味着，尚需引入其他维度才能更好地彰显该时段诗歌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以降的诗歌较之过往的任何时代，都更深刻地受制于外部的挤压与牵引，它经由文化与社会系统得到展现，这是诗歌书写的语境和现场。但是，源于现实情势和语言策略之间的非决定论关系，如何处置诗的外部 and 内部，在该时段的诗歌研究中将更费思量。

在成熟的、有活力的体式中，外部冲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形式结构吸纳，成为内心情致和语言节律的交响，并生动隐现于语言的坡度、拐弯和褶皱中，最终呈现为已然被形式化的体制和外观。有鉴于此，就必须强调，密集的诸多事件无论裹挟多少或峻急或迂缓的声浪，诚其被物化成了语言的现实，对它们的谛听从来都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语言秘纹中的声响，也只有在这里，声响才不是它自身的空洞回声。一如折射定律惟有在光线、物质和观看之间才能成立。这就是为什么，在深刻书写家国情怀的屈原和杜甫那里，几乎难以将他们的遭际从文本中剥离出来，相反，只有深入到内部，才能更好地听到和看见。倘若企图以切割和分离的方法还原、捕捉“外部”，以为它是可以从诗中轻易度量、轻松揭取的“外部”，必将误入歧途。

有人或许会说，楚辞与唐诗作为诗的类型在其时已高度成熟，是为可依傍的体式，再假以天才自是辉煌的创造，水乳交融后的形质当然再难以也没有必要分离，而转到不成熟甚至备受质疑的体式时，“外部”与“内部”的捭格如此扎眼，在技术层面，自可以将它们分离出来。然而，在某种体式中调适自我的诗，无论有多少权宜性、短暂性和不稳定的特点，无论时势与语境中的世界之表象多么难以呈现，“外部”从来难以自外于“内部”，“内部”也从来不能独善其身，而是一同隐没在诗的编织物之中。内与外之间的缠绕使得人们不能轻忽如下事实：诗必得从美学自律与经验冲击的双重挑战予以考量，而该时段诗歌较之以往，譬如盛唐时期在既有体制上加富增华的诗歌，益发深刻体现为矛盾重重的探求、质询乃至重建——如何既不自外于美学自律性的准则，又不自闭于对经验的开放。这

其实昭示了，诗作为非透明的媒介，对它的探讨必将遭遇的困难，语言不可能在真空自我建构，同样，文化与社会系统也不可能自我表征，它们错综于、混杂在具体的形制的实践中，成了诗的“制品”。

在我们这里，理解晚清至“五四”的诗歌，自然也要面向如下目标，即诗最终必以内部反应的方式面对“外部”。但是，作为对内外关系的分辨而不是分离，叙述策略上却必须以“外部”作为起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突出“外部”的双重性：它既是强大的势能，又是有待确认的后果。换言之，“外部”是一个绝对的、却有待在语言中彰显和检验的“前见”，它成了人们打量该时段诗歌的入口。

当然，外部世界在具体诗人那里的亲疏关系或大相径庭，有人拥抱现实急切于诗歌之力的挥发，又有人背对时势幻想于纯粹的吟哦，但即如后一种类型，一方面他们的语言态度也不过是以拒绝的姿态重叙外部，并显现为伦理态度的折光，这是因为，无论拒绝还是沉溺，在语言的维面必将反映相应的曲径，实际是作为承受者的语言被改写的写照。另一方面，“外部”也被语言改写，哪怕前一种类型亦然，源于“外部”进入诗中时，绝无可能无抵抗地长驱直入，这和语言特质相关。

毋庸讳言，势能指的是现代性在经验层面的运动，作为动力或压力展现于诗所寄身的文化与社会系统中，体现的是普遍性，后果指的是经验介入和语言策略之间的异质性问题，它沉积在语言的维面，体现的是特殊性。就前一种情形而言，现代性业已成了颇具代表性的、对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影响甚巨的框架。在今日的理论视域中，尽管质疑和非难它的内涵与外延的声音不断涌现，尽管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态、文化格局也处于戏剧性动荡的语境中，但是，转播、重组或者关闭现代性的话语频道都将颇费踌躇，因为无论与后现代性或别的什么理论路径进行对话，它仍旧是要求不断发掘、拓展的解释学问题。

为此就能理解，用现代性的框架处理该时段的文学为何被相当广泛地运用着，尽管背后的动力与诉求经常悬而未决。显而易见的是，现代性作为“问题”在近年来晚清文学的重评以及清季民初思想史的研究中，被不

断“意识”到且获得了有力呈现。王德威对晚清小说被“五四”遮蔽予以了颠覆性的反拨，振聋发聩地追问：“究竟是什么使得晚清小说堪称现代，并以之与‘五四’传统所构造的现代话语相对应？又是什么阻止我们谈论晚清时期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①将“现代”的标杆予以前置，对于拆除“五四”新文学强硬的权力话语樊篱，的确功不可没，把“五四”老套视野中充满歧见与压抑的“他者”眼光有力地转到了晚清对“自我”的呈现，生机勃勃的晚清和“五四”之间不是差价关系，而是“共谋”关系。^②重新张扬被“压抑”的晚清不仅表现在文学上，史学上亦然。王汎森梳理晚清“新史学”的命题时发现，自梁启超《新史学》的出场，一种足以“从头写史”的格局被奠定了。^③从晚清的“新史学”中人们既能感到强烈的政治意味，也能体会现代时间试图展开新规划的冲动，后者意味着强大的现代性诉求。

以渗透和流动为特征的现代性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语言这种介质却要以一定的方式对现代性作出反应，正是在这里，无界别的绝对主义被奇妙地收缩、黏着在时空落差、语言特性所盘踞的部落之中，再次被多重差异纽结而成的特殊性所标定。因此，尽管王德威重评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富于启迪，^④但是，诗文类与小说有巨大的差异，它在承受、汲取或拒斥现代性时可能和小说不同。比如晚清诗歌的评价问

①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页。

② 陈平原梳理中国现代学术史时指出：“古史辨运动与晚清经学的联系脉络清晰，常被论者提及；至于哲学、文学的变革以及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建设，也都适合于戊戌生根、五四开花的论述思路。”从学术范式更新的层面考量，则可以说是戊戌、五四两代人的“共谋”。（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6页）

③ 参阅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④ 李杨详细分析了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其一，挑战了“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性的‘五四起源说’”；其二，这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超越或质疑‘何为现代、何为传统的旧范式’的典范”，“通过解构‘晚清’与‘五四’的二元对立来进一步解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并进而质疑历史的进化论、发展论和方向感。”（李扬：《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第145~159页）

题，它的命运是否如王德威对晚清小说所作的断言，有着“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倘若更多地留意诗文类成规的制约性，是否将挖掘出另一种景观？事实上，必须看到晚清诗歌深陷于古典型的美学机制中，这是一幅古典与现代性相互缠绕的图景，进而言之，某种未得张扬的现代性的压抑很可能来自古典本身。

我们并非对诗歌遭遇的现代性之强弱表示犹疑的权衡，它相当深刻地载入到了其时中国的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被迫承受还是主动追慕。然而，面对诗中的现代性问题时，一方面，不能把文化与社会系统凌驾于诗之上，企图以此立判诗的高下，如此极易滑入浅陋的机械决定论难以自拔；另一方面，不能将诗仅仅视为纯粹的语词符号的组合，陷入某种康德式的抽象，后者惯于与外部掩面相对。因此，该时段诗歌应当理解为自外部策动的历史语境与从内部持守的文类规范之间，即经验与体式之间不断角力、相斥和包容的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体察出它如何在异动中走向变奏。

二

有鉴于此，必须就语言维度之中的对现代性的特定反应作进一步梳理。但明眼人必已看出，我们不仅绕过了现代性从西方进入中国时的文化差异性，甚至忽略了对现代性在西方的源起与发展的辨认，径直奔向现代性在语言特殊性中的表征问题，在承认现代性作为“前见”的同时，有意抹去了有待分辨的现代性的多义且充满歧义的“内容”，是为置语境的限定于不顾的理念化地使用现代性。从严格的逻辑关系看，无疑是一种僭越。的确，在“内容”层面，现代性有丰富且复杂的面相。

在与文化身份、政治意识密切相关的一类研究中，譬如思想史的研究，没有具体时空的限定和差异性的社会人类学方向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的逻辑起点即是破除文化统一性的幻觉，这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和解释现代性。显然，作为来自西方的概念，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有尺度与范围的争议。本杰明·史华兹就严复遭遇的中西文化冲突困境指出：“在对待

西方与任何一个确定的非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冲突问题上，我们必须同时尽可能深刻地把握双方的特征。我们所涉及的并非是一个已知的和一个未知的变量，而是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① 在史华兹看来，西方和中国均非不言自明的“已知量”，应谨慎地深入各自文化差异的内部把握研究对象的特征。就中国而言，封建帝国崩溃过程中伸展的现代性诉求，它的品格不能以西方（欧洲）的理性和启蒙动力作为绝对的评判标准，无论发展阶段还是远景目标均和西方有相当的差别。

不惟如此，从西方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看，也没有某种口径统一的理论能够轻便征用。有马克思、韦伯的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者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原则上的现代性，也有哈贝马斯的试图弥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现代性，等等。哈贝马斯把现代性工程更深深地扎入到发达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经验现象中，既作为对马克思、韦伯的现代性的修正与拓展，又作为对后现代理论冲击下的这项“未竟事业”的辩护。^② 但无论哈贝马斯伸延到“现在”（尤其是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多么雄辩，不可轻忽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雄心与梦想源于应对时代语境抛给他的压力——改

① 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第1~2页。

② 尼格尔·多德出色地梳理了哈贝马斯在修正或者拓展马克思、韦伯的现代性构想方面的努力。（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26~154页）从后现代视角对现代性理论冲击最有力的或许是利奥塔，现代性被认为是与启蒙相关的宏大叙事，必须遭到清算和否弃。后来利奥塔发展出以后现代性涵括或吞噬现代性的观点，以此彻底悬搁现代性的合法性，他抓住现代性不断伸延和超越的时间问题：“后现代性总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我应当说，正相反：在现代中已有了后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时间性，它自身就包含着自我超越，改变自己的冲动力。现代性不仅能在时间中自我超越，而且还能在其中分解成某种有很大限度的稳定性，比如追求某种乌托邦的计划，或者解放事业的大叙事中包含的简单的政治计划。现代性是从构成上，不间断地受孕于后现代性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26页）哈贝马斯不能同意这种思路，因为在他看来，现代性是“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不仅表现为理论的‘自我意识’，表现为针对一切传统的自我批判立场，而且也表现为‘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个传统的回顾》，《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81页。）

进（装）过的马克思等人的原则如何与当下的资本主义现实展开周旋和抗争。^①

实际上，现代性在西方和中国的争议，均围绕它在相应文化语境中量值的多少展开，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这种分辨意义深远，某种程度上，只有推定现代性的量值，才能推定与此紧密关联的文化与政治，反之亦然。但是，对于已经进到诗中的现代性，应予以关注的重心与其说是它的量值，毋宁说它成了一个关系项进到诗中时引致的语言策略的反映问题。比如分属两个不同背景的梁启超和刘大白，他们表达的现代性体验，“内容”上虽有鲜明差异，但进行精细辨认的任务应该交给思想史，因为它对于把握晚清至“五四”时期诗歌的更内在特性，几乎毫无助益。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写道：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其时人静月黑夜悄悄，努波碎打寒星芒。海底蛟龙睡初起，欲嘘未嘘欲舞未舞深潜藏。其时彼士兀然坐，澄心摄虑游窅茫。正住华严法界第三观，帝网深处无数镜影涵其旁。漠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

① 帕特里克·贝尔特言简意赅地表彰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的事业无疑是勇敢无畏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案已被大多数人抛弃的时候，哈贝马斯旨在为批判理论找到新的哲学基础。”（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190页）当然，哈贝马斯要应对多方面的危机，在回应卢曼的系统理论时，他申说了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的关系，并批评马克思对系统分化不够注意：“就资本主义经济而言，马克思未能区分系统分化的新层面（它是随着由媒介控制的经济系统的出现而形成的）与这种新层面在不同阶级那里所获得的制度化。”针对卢曼的系统理论拒斥生活世界的观点，哈贝马斯进而强调主体间性和实践哲学的重要性，并特别看重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其中文化和美学的力量尤为突出：“自主的公共领域只有依靠不断合理化的生活世界所提供的资源才能显示出其优势。文化尤其如此。所谓文化，包括科学和哲学解释世界和解释自我的潜能、普遍主义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所具有的启蒙潜能，以及审美现代性的激进经验内涵等。”（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规范内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398页、409页）

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①

将“新世纪”这种现代时间作为主体确立自我的标杆，所谓“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时间和自我认同于此合流了。在梁启超这里，现代性是有待主体拥抱的崭新事物，它向未来无限伸延。但是，在刘大白的《淘汰来了》^②中情形已变得截然不同，现代性既是动力也是焦虑：“回头一瞧，淘汰来了！/那是吞灭我的利害东西哪！/不向前跑，怎的避掉！/待向前跑，也许跌倒！/唔！就是跌倒，/挣扎起来，还得飞跑！/要是给他追上，/怎禁得他的爪儿一抓，牙儿一咬！”在“向前跑”和“淘汰”之间划出截然的界线，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人们甚至可以从“就是跌倒，/挣扎起来，还得飞跑”体会到现代性特有的英雄主义意味。

晚清至“五四”的时段中，可以找出更多类似的诗歌文本，就它们承载的林林总总的现代性体验而言，人们将会认同福柯对现代性的描述：

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精神气质（ethos）。^③

然而，在该时段的诗歌中，无论现代性体验多么强烈，作为“思想和

① 任公：《二十世纪太平洋歌》，1902年《新民丛报》第一号。

② 大白：《淘汰来了》，许德邻编《分类白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352页。

③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第430页。